

数智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的内在逻辑

胡柳娟

[摘 要] 城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空间，城市社会活力的激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中国城镇化率的持续攀升和数智化时代的到来，既为城市社会活力释放提供了新空间，也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城市治理的领导核心，在城市激活社会活力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组织、凝聚、服务的作用，形成了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数智引领四大机制，为激发社会活力提供了治理环境、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力，充分体现了党建引领释放社会活力、社会活力拓展党建的双向互构关系。在数智时代，要把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活力推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就需要站稳人民立场、整合基层党组织资源、适应城市现代化发展要求、推进数智技术规范化的。

[关键词] 数智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基层治理；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章编号]** 1002-3054(2026)05-0119-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20260511

一、引言

城市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场域，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截至 2024 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达 67%，是全球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城市化国家。面对快速发展的城市社会，“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型城市”^[1]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重视的关键问题。城市社会活力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是指社会行动主体自身具有内生活力、社会行动主体之间合作共生的一种社会发展状态。^[2]这一概念从本质上反映了城市的实践形态与结构：城市化进程不仅带来社会生产模式、居民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的系统性革新，也推动社会主体心理结构、文化认知与价值取向的动态转变，从而加快了社会整体发展的节奏。与此同时，数智化打破信息壁垒、优化资源配置、精准响应社会需求，其在城市社会治理中展现出的赋能效应，极大拓展了城市社会活力的释放空间。从核心特征看，社会活力被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参与主体多元化形成了参与活力；跨主体、跨领域的社会协作形成了协同活力；公共服务响应即时化形成了服务活力；技术创新化形成了治理活力。这些特征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数智时代城市社会活力

[收稿日期] 2025-08-07

[作者简介] 胡柳娟(1989—)，女，湖南娄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26 年“青启计划”资助项目(2026QQJH07)——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与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的关系研究。

的完整图景。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和直接参与者，始终将激活社会活力作为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主流政治话语导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3]；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4]。由此，从宏观的国家治理视野出发，构建出了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的理想模式。这种模式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的引领中，如何最大程度地激发城市社会活力。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的分析框架，探究数智化时代下党建如何引领城市社会活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从学理基础层面，回溯中国共产党城市基层治理转型与社会活力的内在关联；从运行机制层面，剖析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的具体作用机制，厘清“党建如何引领”“社会活力如何生成”的内在机理；从内在逻辑层面，明确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的双向互构关系；从优化路径层面，为数智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提供实操性路径选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注入更强劲动力。

二、社会活力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产物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5]然而，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并非自然达成，而是遵循着特定的生成逻辑。

（一）社会活力在现代化中孕育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一个城邦一旦完全达到了这种程度的整齐划一便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6]他对“多样化”城邦发展趋势的预设前提是“城邦不仅是由多个人组合而成，而且是由不同种类的人组合而成。种类相同就不可能产生出一个城邦。”^[6]事实上，这种城邦的“多样性”发展是基于人的“类本质”特征。换言之，人处于某一社会共同体之中的稳定状态是以人与人、人与生活、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的世界，就是国家与社会”^[7]。这一特性决定了互动关系的产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机会，在带来社会结构变迁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运动规律来看，人在不断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创造了社会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的创造过程，就是改变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人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过程，进而逐渐形成现实的生产发展及新的生产关系。由此创设出人类社会活动互动化、组织化的结构，即国家和社会。然而，这种互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通过一定的规则、程序、理念、制度等要素聚合在现代化政治形态内，建立以社会治理为基础的现代化国家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体系为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统一制度、统一法律及一体化治理范式的形成奠定了决定性基础。如此一来，以治理视角探讨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便凸显出其本身的“张力”：治理为整体向上的现代化提供了内在动力，并以完善的社会规则和富有活力的社会状态作为外在表现，让现代化的成长有了与之相适应的历史必然性。所以，在现代化力图突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障碍的同时，社会治理的构建和社会活力的释放也在这种整体迈进中成为一种战略选择。二者所面对的逻辑变革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现代化直接从正在发育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出发，通过社会发展形态的突破性转变，衍生出具有战略性空间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活力，并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力量。

(二) 中国式现代化与城市社会活力

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进程中，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活力关系的呈现也依然遵循着互动逻辑。中国从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首要标志是以“对人民的肯定”为起点，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在实现路径上，首先确立公共权力围绕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展开，即公共权力不是由一部分人掌握，而是由全体人民掌握。所以，对于当代中国而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实质性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重新获得公共权力，把人民置身国家和社会之中并有机统一于公共治理体系。由此，便可以形成难以比拟的优势和特点：一是能够确保现代化国家始终围绕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二是能够确保现代化国家的权力体系始终牢牢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三是“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9]，就能够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四是能够确保中国共产党为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领导基础。由此，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国家政治体系得以确立。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的历程可知，现代化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创新，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组合方式得以呈现。从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构建计划经济体制进程中推动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其基层社会治理以单位制为主，“反映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高度重叠”^[10]。从“中国式现代化”转型到“中国式现代化”定型，现代化图景由此展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人民的二元互动合一，释放了改革时期的巨大发展能量”^[11]，让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社会“蜂窝状”的结构让城市生活格局快速流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多点、多重关系组合加速了城市的组织化变革，催生出城市运转的新空间：“政企分开”的推进，使大量“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形成了具有独立经济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城市人口；经济层面的平等诉求必然延伸至政治、文化及社会地位领域，对城市治理的民主化提出了新要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人口的大量涌入，如何将异质化、流动性的人口有效组织与整合，成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这种治理场景的深刻转型，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城市基层治理提出的重构要求。城市基层治理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人民群众的独特工作机制，创造了一个更为高级的工作形态以适配异质化社会。这其中蕴含着现代化的使命，即“不断增强社会机体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打好坚实的社会基础”^[12]。

三、数智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的运行机制

以 ChatGPT、DeepSeek 等生成式 AI 工具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数智化技术正重塑社会运行方式，政党自身也在技术的演进中实现自我完善。数智化在治理结构中的融合张力在于：通过数智技术激活政党治理体系的内生动力，“自觉推动自身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运作方式、组织结构实现现代化转型”^[13]，使治理资源“在策略板块下实现组织资源配置动态最优化”^[14]，“把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5]。由此，数智化使“党建引领”以具象化的结构和形式发挥组织、凝聚、服务的作用，推动政党与城市基层治理一体化。

(一) 政治引领机制

政治引领机制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结构的核心要素，是创造社会秩序的力量，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

力量。政治引领机制强调的“党的领导”构成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主轴”，包含着政治和社会双重属性：在政治属性上，“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16]，核心是坚守政治立场、明确政治纲领与实践政治目标；在社会属性上，政治建设以规范基层政治主体关系、建构稳定政治体系为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架构。进入数智时代，政治引领通过创设数字化基层社会政治互动空间，增强政治系统的自适力，实现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与治理活力的协同提升。

从政治引领的政治属性看，数智化手段为城市基层党组织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党的权威和认同、保持政治定力奠定了基础。从政治引领的社会属性看，数智化让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更精准地嵌入基层治理各环节，压缩了社会治理的存在空间，成为激活城市社会活力的前提。无论政治属性还是社会属性，在数智化背景下，政治引领机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政治领导是城市社会活力的生成之源，而数智化则是保障治理资源高效配置与主体关系动态平衡的重要支撑。从现行运行案例来看，政治引领的发生渠道主要包括线上线下联动的政治动员。如四川省雅安市自 2024 年 6 月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以来，依托线下平台，推动全市社区与联建单位累计合作 1500 余个志愿服务项目；同时，依托现实渠道实时发布项目进展情况和群众反馈意见^①，这既做到了党的理念、政策的“落地”，又能够聚集基层党建资源，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功能。线上政治学习让党员学习更便捷，例如辽宁省东港市依托“云上学”网络学习阵地，整合学习资源。通过“一个主会场+N 个分会场”的形式，在 2024 年累计组织线上理论宣讲、技能培训等活动 800 余次^②。数据驱动的线上政治互动实现了民智民意“一键直达”，例如杭州市富阳区通过“联民桥”云平台“反映—交办—反馈—评价”的闭环互动机制，并接入 12345 热线等多个数据源^③，这一机制能够提前预判并线上协商解决矛盾纠纷，为城市基层治理主体明确了权责边界，也有效避免了因多元诉求冲突导致的治理失序，确保基层治理活力在规范框架内有序释放。

（二）组织引领机制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机制中，组织建设是始终坚守的优良传统。数智时代，社会结构从传统的“差序格局”迅速转向原子化状态：个体与群体间的联结纽带弱化，社会利益诉求呈现分散化。这既提出了高效治理的需求，也蕴含着一个关键命题：党组织如何通过数智化手段将分散的社会单元重新凝聚，“以集成联结与多维互动促进社会充满活力”^[17]。从这个意义上，组织引领机制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把领导体制、思想引领体系、群众工作体系、社会工作体系与社会治理相关主体协同起来，在产生治理‘涟漪效应’的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结构的再组织、再塑造、再激活、再治理”^[18]。

首先，数智化优化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组织覆盖体系，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搭建起了纵横交错的架构。例如，上海市黄浦区探索出“微网格”组织治理体系，按照人口规模、资源配置、服务管理便捷的原则，以小区和若干楼组设置微网格，每个微网格覆盖 300—500 户。同时，链接“街道—街区—居民区—微网格—楼组”五级组织体系^④，每个网格均配备党员骨干担任网格员，将组织触角延伸至治理最末梢。这种体系能快速实现层级之间指令传达、资源调配与责任落实，避免了原子化社会中“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其次，数智技术推动政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空间重构与流程革新，各地探索的“一张图”“一部手机联通千家万户”等实践，重构了党组织信息传递路径、优化了资源配置方式，打破了传统治理的时空壁垒，使党组织与党员、群众的连接从“层级传递”转向“网络互动”，实现治理精准度与响应速度的双重提升。最后，数智化助力吸纳新型群体。近年来形成的“治

理主体数字画像系统”让数智技术参与到将新兴群体纳入党组织的过程中，适应了现代化治理对系统协同的要求。通过新兴群体的带动作用，可以填补城市治理盲区，使多元主体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伙伴”，最终推动城市社会活力从“被动激发”走向“主动生长”。

(三) 服务引领机制

“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9]这是服务引领机制的根本宗旨。这一理念通过数智赋能体现为对人民群众现实需求的精准回应与切实满足：“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对事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周密部署，系统推进各方面工作。”^[20]因此，服务引领机制，通过推动党建引领与数智化服务的深度融合，将“党建+基层治理服务”的实践场景延伸至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网络中。这使治理方式、沟通机制、服务渠道最终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效能，成为激发城市社会活力的核心标识。

第一，数智化构建需求响应体系，将党的群众路线与现代治理方法相结合，构建起从需求收集到效果反馈的全链条体系。例如，上海依托“线上问卷+线下座谈”的方式，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社区养老设施配套等高频需求信息进行常态化收集。通过制定“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的三单对接机制，服务供给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认领”。第二，数智化升级“15分钟便民服务圈”效应。“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际上是以基层党群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数智化为技术手段，推动城市治理资源与服务力量实现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升级。例如，杭州市已划定覆盖日常生活服务的“5分钟生活圈”1690个，涵盖文化、体育、教育等公共服务的“15分钟生活圈”344个^⑤。通过打通教育、卫健、人社等部门系统与社区数字平台，城市居民可以用手机或自助终端办理社保查询、入学报名、老年证申领等事项。同时，这种“一站式”服务，还提供LBS导航、线上预约等功能，大大提升了办事效率。第三，数智化带动城市“关键小事”的解决。从电动车充电桩安装到小区噪声检测，数智化将解决这些“关键小事”的关爱服务直达“家门口”，强化了人民群众对党组织的情感认同。当这种信任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进一步转化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一言以蔽之，服务引领机制的深层构建价值在于重构了基层治理生态。党组织的数智化服务实践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党建引领不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转化为社会活力的“催化剂”。

(四) 技术引领机制

从实践来看，各地探索的“党建+数智化”治理模式已显现出破解治理困境的实效：通过数智平台推动党建与业务数据互通，缓解“两张皮”现象；借助便捷化参与渠道激发群众主动参与的内生动力；以数据驱动推动治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创新”转型，助力城市基层治理从“有效覆盖”向“活力迸发”跃升。

数智技术以工具赋能为路径，通过流程再造嵌入政党治理实践，推动城市基层党组织治理机制升级，最终实现政党在城市治理中的空间重构与流程革新。这种引领主要呈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数智技术通过重构信息传递路径、资源配置方式，重塑政党治理生态，使党组织与党员、群众的连接从传统“层级传递”转向新型“网络互动”；其二，借助数智技术中的算法模型与数据洞察，重塑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决策、协同等核心运行要素，实现治理与响应的双重提升，形成数智治理效能。这种以技术效能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构建，致力于将数智技术的数据感知、情景创设、虚实交互等特征，融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实际场景，表现为城市社会交往的数字化延伸（如线上议事平台）、社会活动的精准化服务（如数据画像）、文化表达的多元化载体（如社区数字文化馆）、空间功能的智能化

更新(如智慧物业)等可感知的实践形态。这一形态促进了人与人、人与基层党组织、人与城市生活、基层党组织与城市治理之间的深度交织,实现了信息、资源、知识和文化的高效共享。尽管数智技术并非直接以原动力形式激发社会活力,但其在治理主体连接、治理效能提升、治理资源整合、治理秩序优化等方面的作用,抑制和摆脱了传统治理的内卷化倾向,其具象化成果使“数智化治理”与“烟火气生活”相统一,为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提供了可持续的技术支撑。

四、数智时代党建引领与社会活力的互构关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引领者,“政治—组织—服务—技术”四维引领机制的生成,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进入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形态;另一方面也使城市基层治理与政党政治的现实规律相结合。在数智化技术重塑社会运行方式的当下,这一机制为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的释放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治理资源,既符合政党统领基层治理事务的政治要求,又适应和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治理需求。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数智时代党建引领与社会活力的“双向互构”关联和逻辑:党建引领通过数智化赋能释放社会活力;社会活力反过来又为党建引领提供超越传统的社会观念、社会环境、社会文化、社会机制等资源,反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格局。概言之,数智化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活力的内在关系体现在:党建引领释放社会活力,社会活力拓展党建引领的边界。

(一) 党建引领释放社会活力

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治理资源不断分散甚至流失,这说明在中国基层治理领域需要思考新的治理方式。数智化给予中国共产党更多可能性去激发社会各要素,让城市基层治理与党建引领深度融合,推动国家现代化治理资源和数智化技术资源有效链接至城市基层社会。

由数智化引发的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实际上也推动了党组织功能的转换。换句话说,数智化作为新质生产力在社会形态上的运用,培育了城市治理结构和治理空间的有为意识和态度,实现对组织内生式治理资源的调试和创新。由此,党建引领在客观上成为激活城市基层治理活力的重要力量。这种应对主要体现在:一是重塑和改写着政党政治的运行逻辑,对于致力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建引领”需要从政党政治本质层面阐释现代化对政党政治的深层治理重构机理。二是“党建引领”数智化的实质是在政党主导的治理范式中,以更加灵活的技术体系、组织体系与治理体系来构建充满弹性的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实现更高效的治理效能。三是“党建引领”的格局伴随着城市结构再组织化和治理技术的数智化而形成,使得政党引领与基层治理变革成为可能,让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既彰显政治认同的效应,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主导者、推动者、变革者和实践者,又能产生实际的治理效应,揭示了数智化变革治理模式的实际意义。形象地说,是“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21]。可见,“党建引领”的数智化赋能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使命是平衡政党在城市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关系,进一步讲,体现的是政党空间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在现代化的外部大环境下,围绕着如何通过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激活城市基层社会活力而展开。因而,在现代化、数智化、政党、城市基层治理构成的关系中,一种治理形态激发了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型,促进了现代政治形态的整体转型。

(二) 社会活力拓展党建引领

在城市基层治理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转型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活力的激发和释放,这是现代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社会活力加持之下的城市治理必然会触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变迁,凸显了城市

基层治理密切联系现实的一面。社会活力作为社会发展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实践在数智化技术赋能下的具体延伸。然而，无论数智化给予城市基层治理以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城市基层治理总会围绕着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主体而展开。进一步说，数智化赋能党建引领是一个多维的政治、社会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实际作为，并力图通过数智化重塑治理流程、优化资源配置。数智化赋能党建引领的变革，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政治社会体系，这种变迁不仅体现在治理理念、治理资源、治理对象和治理能力上，更深刻反映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城市治理结构中的引领空间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活力的释放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拓展党建引领的空间。

一是社会活力重塑了党建引领的治理理念。数智化并非冰冷的数字技术，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的深度运用与转化，催生出更广泛的社会参与热情和治理积极性，促使党建引领不再是单向的传达路径，而是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生态。这就意味着，社会活力的有效激发，本身就是治理理念在现代治理体系上的创新性调整与升级，要求治理体系能够更灵活、更高效地回应社会诉求。因而，数智化、社会活力与党建引领三者以同等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基层治理这一既定框架内协同推进，其所蕴含的智慧在于使党建引领的理念更加包容化、多元化，更富有时代特性。

二是社会活力丰富了党建引领的社会资源。活跃的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庞大的专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构成了社会活力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这些主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信息平台、智力资源等又可以通过“党建引领+”搭建的数智化合作平台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实现城市治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拓展党建引领的资源动员与整合能力。

三是社会活力拓宽了党建引领的价值空间。当社会活力得以充分释放之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显著提升，党的执政基础也随之巩固。应当说，这种超越并没有越过或者改变本源性的“人本”逻辑起点。换言之，社会活力释放的增值过程是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及其背后蕴藏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彰显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共通关系并共同建立稳定的现代化关系。

五、数智化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的优化路径

如何把数智时代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活力推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构建出多元、融合、联动的优化路径，是城市基层治理发展及其形态转型的目标。对此，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站稳人民立场

站稳人民立场就是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实际上是要通过一套比较系统化的运作机制来有效建构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22]。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数智技术恰恰为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表达与需求实现提供了新路径。

一方面，要构建“快、准、稳”的需求回应机制。搭建统一的基层治理数智平台，从需求感知到问题拆解，从资源匹配到结果反馈，全流程实现数据整合与智能分析，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针对老年群体，开发“一键呼叫”应急服务模块，联动医疗、社区等资源实现快速响应；针对新市民群体，设置“就业—住房—子女入学”一站式服务入口，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减少材料重复提交；针对特殊困难群体，通过数据画像自动标记需求类型，推动帮扶资源主动下沉。同时，依托大数据分析预判群众高频需求，如老旧小区改造、托育服务供给等，提前联动多部门制定解决方案，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让“以人民为中心”从理念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的服务效能，强化党与群众的情感联结。另一方面，创建协商共治机制。城市作为人口集聚的地理空间，承担的功能因人群能力的

发展和阶层地位的差异而不断演化、发展，既充满多元分歧，又包含理性共识，数智化平台往往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让不同参与群体更便捷地参与城市治理决策。如“线上议事厅”、视频会议、在线留言等社群工具的设立，把原本分散的人民群众组织凝聚到了一起，实现了社会协商与沟通的高度组织化，让社会参与治理不成为一个单轨政治，而是一项多元互动、协商共识的双轨政治。

（二）整合基层党组织资源

党建引领城市社会活力的呈现，关键在于将城市基层社会的党组织与生俱来的政治优势、组织动员能力、政策行动力，迅速在城市基层社会形成全面统筹和深度吸附。与之相适应的优化路径则着重体现为整合城市基层党组织资源，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数智时代的组织优势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是在数据链接之下的资源重组与功能再造，激活党组织的带动力、影响力和引领力。

一是通过搭建党建引领的数智化资源共享平台，构建协同化的组织形态，实现数据更新与资源匹配的动态平衡，推动基层治理主体积极履责、互动、建议、行动、反馈、调整，促进经济单位、政治单位、社会单位、服务单位的整合优化，破解城市基层治理过程中因存在条块分割、人员分割和资源分割等难题造成的“政治冷漠”困境。二是聚焦党组织功能定位，通过数智化优化党的组织结构，推动组织结构从“层级化”向“动态化”转型，强化党的领导和完善治理职能。从横向层面看，大数据精准定位组织覆盖盲区，建立跨单位、跨领域协同的功能型党组织，整合各方面的组织资源，避免治理“空白点”；从纵向层面看，压缩城市基层治理层级，搭建“街道—社区—网格”智能联动平台，推动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转型，确保决策部署直达人民群众。另外，根据城市人口流动性大、产业更新变化快等特点，动态设置党组织的覆盖范围和运行方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同步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党组织管理模式。

（三）适应城市现代化发展要求

“城市更新作为当前存量时代空间生产的主要方式”^[23]，决定了党建引领本质上是动态的“进化”。现代化作为城市社会活力生成的元命题，核心在于通过生产方式革新、空间结构重组、治理体系升级等多维变革，为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提供物质基础与制度环境。当城市现代化进入数智化发展阶段，党建引领的内涵与方式也须随之迭代升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党建工作脱离现代化进程的“悬浮化”，最终形成党建赋能现代化活力的正向循环。

一方面，城市现代化的标志是从“单一空间”向“多元空间”转化，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会活力的运行机理，应该以多层次、宽领域、全追踪式的运行模式和发展样态呈现。在数智化时代，要构建“政党—社会”有机对接和全面一体化的互动机制，需要形成数字空间视野下的政策制定、执行和落实共通平台，创造更为直接、更加灵活、更为精准的为民服务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便成为一个“新型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既能找回基于非血缘“熟人社会”的邻里温情和松弛的人际关系，又能切实感受到来自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还能见证城市现代化带来的新变化。由此可见，“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活力”的工作路径，本质上是要通过城市现代化激活政党的现代化，最终是要释放来自城市基层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参与度。另一方面，以政党文化引领现代化凝聚社会价值共识。构建与现代化相匹配的政党文化，是激发社会活力的精神纽带。要积极挖掘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红色文化，将党的历史叙事与城市发展历程相结合，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建设中的先锋故事。同时，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融合，将“奉献”“先锋队”等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使“党建引领”从事务性工作升华为价值凝聚，为城市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四) 推进数智技术规范化

数智化转型的加速使得整体社会进入“日益量化的阶段”^[24]，形成了党建引领与技术赋能相结合的统合模式。从运作逻辑上看，其赋能逻辑类似“智治大脑”：一方面，依托技术框架构建标准化治理流程，确保党的领导与治理实践的规范性衔接；另一方面，通过实时数据反馈实现治理策略的弹性调整，在动态环境中突破传统治理的路径依赖。这种“规范中含创新”的特质，既是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实践深度融合的制度成果，也是政策高效执行与基层事务自我完善机制协同运转的必然结果。要借助数智链接的叠加效应实现组织功能的二次优化，将服务资源与能力下沉至基层一线，使跨部门协同、跨层级联动转化为“常态机制”，激发基层党组织在治理实践中的能动性、主动性。与此同时，数智赋能城市基层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数据采集过程中因存在地区和个体差异性可能会存在采集盲区，进而带来数据库信息不完善，甚至导致数据作假现象。加上数智技术本身带有网络效应，局部的误差有可能波及整体的治理效果。因而，要建立严格的数据安全标准，定期开展风险评估、签订数据真实承诺书、搭建治理数据“熔断机制”等，以确保数据采集、存储、转化、运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另外，就中国共产党的长远发展而言，“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5]，因而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数智化能力，“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26]，在实践中扩展数智视野和技能，着力提升数智化综合素养。

注释：

- ① 数据来源参见：搭好党建联席会议“平台” 唱好基层治理“合唱”——从“三个转变”看雅安社区治理的“双向奔赴”[EB/OL]. <https://www.yaan.gov.cn/zhangzhe/show/ad2b10f2-cc93-4dc8-be2b-4e8ebe2a1afe.html>.
- ② 数据来源参见：辽宁省东港市：打造智慧党建平台一网通管提“智”增效[EB/OL]. <https://www.12371.cn/2024/11/13/ARTI1731488810435853.shtml>.
- ③ 数据来源参见：富阳：民意民智“一键直达”[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834208411329826&wfr=spider&for=pc>.
- ④ 数据来源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织密社区“微网格”，托起居民“大幸福”[EB/OL].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4/1028/c458448-40348692.html>.
- ⑤ 数据来源参见：杭州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引领共富基本单元建设[EB/OL]. https://jst.zj.gov.cn/art/2024/9/2/art_1569972_58936463.html.

参考文献：

- [1]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25-07-16.
- [2] 王道勇. 在社会合作中增强社会活力[J]. 学习与探索, 2025(7): 60-67.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人民出版社, 2022: 67.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外文出版社, 2022: 338.
- [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30-31.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人民出版社, 2012: 1.
-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91: 1031.

- [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人民出版社, 1994: 152.
- [10] 冯华, 王霞, 谢小芹. 新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变迁[M].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9: 19.
- [11] 黄宗智.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13.
- [12] 包心鉴. 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5(3): 4-14+159.
- [13] 张浩. 政党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大党独有难题[J]. 人民论坛, 2023(1): 17-20.
- [14] 郭令奇, 褚智贤, 廖建新. 意图驱动的自智网络资源按需服务[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2022(6): 82-88.
- [15]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N]. 光明日报, 2019-05-09.
- [1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光明日报, 2017-10-28.
- [17] 何得桂 陈露露. 组织动员与联动治理: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机制——以陕西省 S 县“五同”工作法为例[J]. 党政研究, 2025(1): 98-128.
- [18] 胡柳娟.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J]. 理论视野, 2025(5): 86-91.
- [19]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311.
- [20]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81.
- [2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 商务印书馆, 2016: 33.
- [22] 李海青. 群众路线与使命型政党的成功之道[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3): 5-11.
- [23] 胡琼琼, 王利平. 多人动态讨价还价博弈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研究——以汕头市小公园开阜区更新为例[J]. 岭南学刊, 2024(6): 24-35.
- [24] [英]杰米·萨斯坎德著, 李大白译. 算法的力量: 人类如何共同生存[M].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 33.
- [25]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83.
- [26]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N]. 人民日报, 2019-05-17.

The Internal Logic of Party Construction Leading Urban Social Vitality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U Liu-juan

Abstract: As the basic spa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stimulation of urban social vitality is the core issue of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ris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rate and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t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space for the release of urban social vitality, but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urban governance. As the leading core of urban governa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activating urban social vitality through Party building. In this proces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given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 cohesion and service, and has formed the four major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service leadership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leadership. It provides a governance environment, social foundation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stimulate social vitality, fully reflecting the two-way mutually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in which party building releases social vitality and social vitality, in turn, expands Party building.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push the vitality of the city's grass-roots society to a broader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firmly uphold the people's stance,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Keywords: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urban social vital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编辑：陆晓静】